



清华中美关系评论

New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s: A Strategic Guideline for U.S.-China Cooperations

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协作新方略

主 编◎孙 哲

副主编◎刁大明 张旭东

时事出版社





清华中美关系评论

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协作新方略

New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s: A Strategic Guideline for U.S.-China Cooperations

主 编◎孙 哲

副主编◎刁大明 张旭东

时 事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协作新方略/孙哲主编. —北京：
时事出版社，2013. 12
(清华中美关系评论)
ISBN 978-7-80232-658-3

I. ①新… II. ①孙… III. ①中美关系—研究
IV. ①D822. 37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5070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巨山村 375 号
邮 编：100093
发行热线：(010) 82546061 82546062
读者服务部：(010) 61157595
传 真：(010) 82546050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0.25 字数：240 千字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6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主 编：孙哲

前 言：孙哲(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一章：张旭东(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第二章：刁大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第三章：孙哲、刁大明

第四章：刘建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

第五章：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第六章：肖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第七章：龚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部研究实习员)

第八章：孙哲、徐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第九章：李家成(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第十章：孙哲

结 语：孙哲

目 录

前言：全球领导力更新与中美关系未来	(1)
-------------------------	-----

第一部分 选举年与中美关系

第一章 领导力变革：2012 年美国大选全盘解析	(13)
第二章 国会山洗牌：2012 年美国国会选举与中美关系走向	(57)
第三章 “第二任期魔咒”：2012 年大选与美国政治的塑造	(94)

第二部分 中美关系中的战略互动

第四章 中美“亚冷战”：特征、成因及未来趋向	(113)
第五章 霸权护持：奥巴马政府的国际经济战略	(141)
第六章 “藏独”活动美国化：达赖集团在美活动的 延续、变迁与对策	(167)
第七章 能源独立：美国“页岩气革命”的现状与前景	(190)

第三部分 亚太局势与中美关系

第八章 跨越白令海峡：美国战略东移与美俄关系互动	(219)
--------------------------------	-------

第九章 朝核问题：中美两国的利益平衡与战略博弈	(238)
-------------------------------	-------

第四部分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第十章 两岸前景：2012 年岛内选后和中共十八大 后台海政策的评估与走向	(271)
--	-------

结语：“中国梦”引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289)
--------------------------	-------

2012 年中美关系大事记	(292)
---------------------	-------

前言

全球领导力更新与中美关系未来

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这样解释造成人类空前悲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何最终会爆发：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原本长期处于健康的竞争关系，但是雅典实力的增长与对外扩张引起了斯巴达的妒忌和一些城邦的不满，恐惧和误解的积累最终使得双方兵戎相见。

仔细研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们发现除了陆海恢弘的战争图景，其实更令人掩卷长思的是斯巴达和雅典内部各自出现的严酷惨烈的党派斗争和这两个城邦之间复杂的权势竞争以及微妙的战略心理变化。斯巴达和雅典为了捍卫“安全、利益和荣誉”而做出了具有世界大战意义的战争决定，随后展开旷日持久的征服、抗衡以及明争暗斗，不仅让两个体制不同、战略有别的城邦国家在政治、军事、外交、心理上反复较量，而且战火波及到了当时的整个地中海文明，数百个城邦在两极格局的支配下被迫做出联盟与“被联盟”的痛苦选择。

战争是残酷的。为避免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人类必须努力寻求和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共存之道。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面对亚太战略格局的重大调整，中美两国似乎也悄然间走到了同样重要的历史节点的抉择面前。

回顾 2012 年的中美关系，我们不能不把视野首先拉到中美竞逐的历史大舞台之上，从“国内政治回归”角度来看全球体系及各国内部的政治走向，从而进一步考察中美两国竞争与合作的背景。

2012 年可谓是全球范围内的超级选举换届年，大约有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首脑进行换届，约 51 个国家和地区的议会立法机构完成更替。在密集的选举换届时间表中，既有美、俄、法这样的世界性政治经济大国，也有墨西哥、委内瑞拉、韩国等初具区域影响的新兴经济体；既涉及到债务危机四伏的西班牙、希腊、冰岛等欧元区国家，也涵盖了埃及、也门、利比亚等“阿拉伯之春”后的重建国家。如此大规模的全球政坛洗牌，无疑牵动着大国博弈的走向，为整个国际格局带来了不确定性的同时，也为中美关系未来十年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总体而言，选举政治加剧了国际舞台的戏剧性色彩，其效应从短期震荡发酵为长期波动。

其一，面临选举换届的压力，执政者往往将视角更多聚焦在国内议题领域，特别是在后危机时代的当下，各国经济议题成为当选与否的关键所在。这就意味着，不少国家领导者在 대선 年疏于保持更为紧密的沟通，这也就积累了各国协调的成本，放大了产生分歧与摩擦的可能。

其二，在过分关注经济等国内议题时，执政者极有可能无法短期内有效达成提振经济的现实绩效，于是转而跌入“民粹主义”的怪圈当中。尤其是在对决竞争激烈的政党政治的扭曲之下，参选者炒作某些外部议题，将国内矛盾转嫁为国际矛盾，不但推卸了自身责任，而且还起到了在危机中强化自身领导力的效果。美国大选中“驴象两党”对中国议题的“示强竞赛”、日本野田内阁以及石原之

流关于钓鱼岛的“购岛闹剧”，皆出自这一逻辑。

其三，选举年之后的国际格局迎来了政策的调整。值得密切关注的是，即便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领导层实现了连任，但其所处政治环境仍旧处于变动之中；而对于那些领导者更新的国家而言，是否保持政策延续性，或将是牵动未来数年全球与区域事态发展的关键指标。

在众多国家的选举换届中，俄罗斯的总统选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延续性与挑战性并存。作为2012年最先上演选战的大国，这场“独角戏”其实最无悬念：普京以63.6%的高票击败其他4位参选者，时隔四年，重返克里姆林宫。在“梅—普组合”顺利翻转为“普—梅组合”之后，俄罗斯的内政外交将在同一轨道上继续高速运转。但如今的普京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俄罗斯长期以能源主导经济的单一结构以及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使得公众开始逐渐厌倦持续了13年的“强人模式”。普京如果仍旧一味追求所谓“大国复兴”而不关照公众要求的话，俄罗斯的外交无论多么强势，其国家命运也不能不令人担忧。

相比而言，法国总统选举则折射出另一番情形，即“变革知易行难”。显然，社会党人奥朗德击败谋求连任的萨科齐是这个选举年中的最大惊奇。选战之前，面对毫无起色的经济与内政议题，萨科齐转而在利比亚问题上冲锋陷阵，但还是无法留住失望的选民，最终被“请”出了爱丽舍宫。然而，从新政府履新后的表现观察，此前毫无执政经验的奥朗德可谓回天乏术。在法国经济明显衰退、其支持率持续下滑之际，奥朗德只得走回了萨科齐的老路，在叙利亚问题上大做文章，博取民意眼球，凸显了被选举政治“绑架”下的无奈。

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美国、日本以及韩国的三场选战对中国外交和中美关系的发展至为重要。

2012 年 11 月，奥巴马在高失业率阴霾的笼罩下实现连任，面对复苏迟缓的经济，撕裂极化的社会以及无法弥合的党争政治环境，外交俨然成为奥氏保全其政治遗产的护身符。自成功当选连任之后，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战略势必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持续推进，而这种推进有可能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多议题的。换言之，美国的“重返亚太”，不仅仅是以往的军事安全领域，也将广泛涉及到政治、外交、经贸、人文等多个领域。例如，具体到经贸领域而言，美国将“重塑”在亚太的经济主导地位，大力推动 TPP，制定地区贸易规则，主导经济合作进程，提高亚太参与计划，增加小国经济援助，增加对该地区的经济控制，这其实在客观上为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战略布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是年 12 月，日本和韩国的两场选举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着中国的周边局势。自 GDP 被中国超越和“3·11 大地震”之后，日本逐渐从一个东亚共同体的自信倡导者收缩为美日安保条约的偏执坚守者，其国内政治风向急向右转。在安倍上台之后，右翼保守思想出现巩固倾向，以钓鱼岛为借口不断强硬的安倍政府在对华外交上呈现出更多的对抗走向，为东北亚局势平添了纷扰。中韩建交以来，两国虽存在较多共识，但近年来特别是李明博上台后在朝韩统一问题上表现出焦躁不安的一面，甚至认为中国“阻碍”了半岛统一进程，因而韩国也在一定程度上积极迎合了美国的“重返”战略。这一态势在保守派候选人朴槿惠当选后虽然有所改观，但是朝韩关系如果不能真正改善，那么南北缓和的外交空间也会受到挤压，朝美关系更无从解开死结，半岛局势仍然可能重新陷入新一轮紧张的怪圈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共十八大所开启的领导层更新可以被视为是世界 2012 年大选换届年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次会议为中国外交明确了三个重要的基本判断，即战略机遇期、和平发展道路以及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中国政府郑重宣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

从这些基本宣示出发，中国应该对超级大选之后的国际新形势构建新的战略目标，针对中国内政外交面临的诸多挑战迎难而上，在有步骤、有策略地巩固周边、区别对待的同时，以内政修明、外交担当的姿态向世界证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行性。

当然，对于今天中美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我们再次感叹，世界上很少有哪一对双边关系如中美关系一般，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无出其右，而走过的历程却又充满了曲折与魅力；同样，当下也少有哪一对双边关系令各国政治家与学者如此着迷而屡次展开激烈争论，探求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势；更少有哪一对双边关系日益清晰地印证国际政治中经典的权力转移理论，令国际社会焦灼地期待中美如何破解大国崛起的困境并化解对国际体系稳定的负面冲击。

我们同样相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新型”在于它可能是竞争性的，却不是对抗性的。因为中美两国都十分明白，国家的成长是不断超越对手的过程，更是不断超越自己的过程。这种超越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积极地比较国家的创新、善治与民生，而非穷兵黩武或沙场纵横。至于“大国关系”，则在于中美两国都应遵守国际秩序，力争成为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引领型国家。

“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需要顶层设计。这方面，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作为两个国家认可的重要制度框架和沟通平台，已经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新模式、新典范。自2009年启动以来，双方就事关两国

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进行了虚实结合的四轮对话，取得了积极而丰富的成果。例如，在战略对话轨道，双方达成约上百项具体成果，及时启动了中美亚太事务磋商、中美中东事务磋商、中美新一轮战略安全磋商、多边军控与防扩散磋商及两军务实交流合作等新型交流机制。在经济对话轨道，两国达成的成果初步统计高达218项，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注入强劲动力。

两国之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已渐入佳境，双方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工作习惯和务实的作风。在对话中，双方都基本上做到了针锋相对、坦诚相待。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实效性正在被不断地开发与利用，为确保双边关系发展方向确定了重点。

不能否认，中美对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定位特别是有关“战略性”的高度理解还有所差异。双方对于对话的议题设置及战术性效能还存在分歧。例如，一些美国政要仍然期望能变对话平台为美国“预防危机”的对华谈判机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压力传输器，要求中国在诸多领域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对此，我们要坚持国内的综合协调，做到相关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灵活运用多种外交手段来充分保证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实现。又如，在对话中，中国一直努力加紧充实两国新型经济关系的内涵，即便是对美国提出的一些挑战性的难题，也从容不迫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具体来说，最突出的例子是双方对“公平贸易”问题上的看法。本来，中美经济合作共赢的前景和空间不可限量，但在双边贸易规模已高达5000多亿美元、经济高度依赖的今天，美国仍有一些人苛求中国、迁怒中国，认定中国违反了世界贸易规则和入世承诺，正在与美国进行一场“不公平”的贸易竞争。公平贸易原则，已经成为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争执的焦点。公平贸易要求各国政府、行业协会及进出口贸易的生产者、经营者等相关方遵

守规则，不以一己之私扭曲国际贸易竞争。公平贸易强调平等互利，排斥倾销和补贴，倡导全球树立劳工、环保及社会政策的公平性标准。中国完全认同国际公平贸易理念，也是坚持合作共赢原则的践行者。目前中国与 29 个国家和地区的谈判正在“多点开花”，已经建成 16 个自贸区。在世界 400 种重要商品贸易上，有 222 种中国产量、出口第一，中国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及人力成本为世界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反观美国，我们看到的是两种主张、两种实践：一方面，美国确实还在坚持“自由贸易原则”，这是为什么自中国 2000 年入世以来，美国所有 435 个众议员选区均在不同程度上受惠于对华贸易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在近年自身经济治理乏力的背景下，美国也逐步加大了对公平贸易原则的强调和运用。但是美国的所作所为，无非是想把对美国一国的“公平”转为其对他国进行贸易进攻的“战略武器”，继续主导经济全球化进程。例如，美国 2012 年创建了贸易执法中心，专门调查别国不公平贸易的做法，力图促进本国出口并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很不幸，中国名列其中。为了保护本国战略产业，美国不惜刻意打压中国，频频将贸易大棒挥向中国。不仅中国输美产品、中国对美投资受到限制和阻挠，连中国的人民币汇率、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国企改革问题都成为美国对华“示强竞赛”的政策工具。

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贸易伙伴合作的意愿是坚定的、不容质疑的。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再次阐述了自己为履行公平贸易原则的主要立场，即公平贸易必须考虑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考虑贸易伙伴之间能力的差异。兼顾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才是最大的公平。好比体育竞赛的拳击比赛，如果不考虑选手自身的条件来分级举办，这种比赛从根本来说是不公正的，势必带上以强欺弱的色彩。就中美两国而言，两国贸易性质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发展中

国家对一个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国正在努力通过参与二十国集团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多哈回合谈判等国际对话和合作机制，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及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美国应该做的，不是竭力激活本国经济的“民粹主义”倾向，而是要急切追究本国政府经济政策失误、主动而积极地降低对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损耗效应。当然，中国再次表达了愿意承担公平贸易的相关责任，但也坚持获得公平对等的贸易权利的愿望。中国这么做是因为在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规则的制定者同规则适用对象具有不对等的话语权。具体到中美贸易关系上，美国作为发达经济体享有很大的“规则优势”。别的不说，联合国的总部在美国，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人垄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美国还享有一票否决的特权。现在，美国还在积极准备创造出更多的区域和次区域的合作模式和组织来“建章立制”，削弱中国的话语权、参与权和规则的制定权。在美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情况下，中国坚持带领发展中国家挑战全球贸易框架中的不公平规则和待遇，目的就是要改进和修正那些不公平的贸易规则。只有赋予中国更对等的贸易权利，才能大大促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创新，真正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国际贸易新秩序。

应当说，通过两国的不断交往和对话，双方对话的攻防态势已经有了很大的转换，中美话语权逐渐走向平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实际上已经显示出两国的政治智慧和外交能力，是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相遇的老问题找到新答案的共同努力成果。

当然，由于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作为支撑，中美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塑造仍然处在探索过程之中。中国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最终还要靠我们自己。但是对于中美关系，任何积极的成果都可以转化为相互学习、为维护各自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的国际利益进行最大限度的合作的重要支点。

本辑“中美关系评论”将对2012年大选年背景下中美关系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进行全面的回顾和梳理，深入剖析中美在各议题领域的互动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改善两国关系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学界的中美关系研究做出微薄的贡献，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第一部分 选举年与中美关系

“新形势下，我们应该深入审视两国关系。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中美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合作来实现共赢？中美应该怎样携手合作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不仅是我们两国人民关注的事，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事。我们应该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从人类发展进步着眼，创新思维，积极行动，共同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我期待着同奥巴马总统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战略性问题进行广泛深入沟通，加深相互了解，促进全面合作。”

2013年6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加州与奥巴马举行会晤时再次强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